

道咸時期嶺南詞壇之考察： 以陳澧及其交遊爲中心^{*}

余佳韻

提 要

嶺南向來被視爲化外之地，學術風氣不盛。十九世紀初期，阮元於廣州設置學海堂，帶來江南考據學文化的同時，亦促進了廣東文化認同意識的形成。

向來論及嶺南詞多著重晚清世變與常州詞學之關聯，而少見道咸詞壇討論。本文由陳澧現存的序跋題記與詞學交遊爲考察基點，試圖廓清道咸時期嶺南詞壇之概況。首先，由於此時期的嶺南詞人先世多源出江南，加之以阮元提倡江南學術的緣故，因而嶺南繼受江南傳統頗深。陳澧等文人論詞多以浙西爲宗的審美觀即源於此。其次，學海堂文人意圖通過文史考證追溯嶺南歷史至南漢，以表出嶺南文化的悠久性與特異性的意識，同樣展現於越臺詞社的集結與《粵東詞鈔》的成書。陳澧的詞學活動和交遊亦受益於此。陳澧兼具江南與嶺南兩種文化身分，通過考察其交遊活動，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道咸時期嶺南詞壇的審美趨向，亦能看到嶺南詞人繼受江南文化的同時，試圖建構嶺南文化主體性之過程。

關鍵詞：嶺南 江南 陳澧 交遊 粵東詞鈔

* 本文初稿“清代中晚期嶺南詞壇的發展初探——以陳澧的交遊爲中心”發表於 2021 年 11 月 19 日香港中文大學古典詩學研究中心之講座。論文寫作期間承蒙香港中文大學蕭振豪教授協助尋找文獻材料，講座中尚承蒙嚴志雄教授惠賜高見，與三位匿名評審專家的建議指正，使本文論述架構更臻完備，在此一併致上謝忱。文中如有任何違誤或疏漏，文責當由本人自負。

一、前言

嶺南位處帝國邊陲，交通信息往來不易，向來爲人以南蠻或化外之地視之，抑或是不得上意的官員流放之處。¹ 治學風氣亦因遠離江浙學術中心，即便自唐以來已有不少出身嶺南的知名文人，如張九齡（678—740）、葛長庚（1194—？）、陳白沙（1428—1500）、屈大均（1630—1696）、陳恭尹（1631—1700）、金堡（1614—1680）等人，但並未形成明確的學術傳承脈絡。再者，由於廣東學術不盛，科舉及第的人數也始終難以與文風鼎盛、士人薈萃的江南地區相提並論。² 直到雍正以後，江南文人以遊宦或遊幕之方式入粵者漸增，³ 加之以阮元（1764—1849）於嘉慶 22 年（1816）任兩廣總督後，因有感於“粵中學術不盛”，遂延續了當年江南詒經精舍的辦學經驗，聘請與江浙考據學相關的文人於堂

-
- 1 學者 Ping Wang and Nicolas Morrow Williams 曾於“*Southern Identity and Southern Estrangement in Medieval Chinese Poetry*”一書中的序言，對“南方”此一概念提出了如下概括，他們提到：“The boundaries of the South in literature are fluid and evolving, an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 focus not on the geographical ‘south’ but on the cultural ‘Southland’ or ‘Jiangnan 江南’ (literally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Southland is a relative concept, on the margin of the Chinese empire.”又：“The south more broadly were seen throughout much of Chinese history as a forbidding, disease-ridden, and barbaric place, and troublesome officials were often dispatched there in exile.”書中以爲文學上所謂“南方”：的邊界是不斷在流動與進化的，不僅是一種地理上的南方指稱，也包含了文化上的南方之地與江南（指揚子江以南）。所謂的南方，在中國歷史上多被視爲禁制、疾病與野蠻之處，麻煩官員的流放之所。傳統對南方的想象與認知亦成爲了後人對嶺南風土的認識依據。關於唐代以來嶺南的地位以及中原人的嶺南想象，可參見：Ping Wang and Nicolas Morrow Williams, “Southland as symbol” in Ping Wang and Nicolas Morrow Williams “*Southern Identity and Southern Estrangement in Medieval Chinese Poet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1 – 18.
 - 2 關於廣東的文化認同形成，另可參見：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頁 165—166。以及 Elman, Benjamin A., “Ch’ing Dynasty ‘Schools’ of Scholarship”, *Ch’ing-shih wen-t’i*, 4.6 (1981), pp.1 – 45.
 - 3 Steven B. Miles (麥哲維) 曾提到珠江三角洲在歷史上曾有幾次較大量的外來移民流入。一波是在明代的萬曆年間，另一波則是清雍正以降。如考察學海堂文人先祖遊宦入粵的歷程，大抵都是在雍乾以降。詳細論述可參見：Steven B. Miles, *Upriver Journeys: Diaspora and Empire in Southern China, 1570 – 185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2017), pp.200 – 206.

中任教，為嶺南學術帶來了轉變契機。⁴ 嶺南詞學亦是於此種時代背景下得到了發展契機。

近年嶺南研究為學界關注的重點，論者或從南洋與嶺南的貿易連結、廣東文人面對鴉片戰爭後新時局的因應、甚至是嶺南博物知識與地景文化考述與結社情况等，結合了文化史的考察之餘，也呈現出多元的研究角度。⁵ 誠如嚴迪昌所言：“清代詞派和群體非常突出地具有地域性和家族血緣關係的特點。這種帶有強烈的歷史文化和地理文化色彩的特性，愈益讓人們看到了社會發展造成的大文化背景與文學事業的密切契合的內在聯繫。”⁶ “地域性”既為清代學術流派建立或群體劃分的重要基礎，包含了群體間共同的審美意態與交遊往來。嶺南地區自不例外。

嶺南詞壇自乾嘉以後漸次興盛，除了早期的吳蘭修（1789—1839）、⁷ 儀克

4 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佈》亦將近代粵學之盛歸因於學海堂之設立，其道：“時則阮芸臺先生督兩廣，設學海堂課士，道咸以降，粵學乃驟盛。”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78—79。又，關於學海堂的創設，美國學者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於《學海堂與今文經學在廣東的興起》一文中已有詳細考述。可參見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撰、車行健譯：《學海堂與今文經學在廣東的興起》，《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頁13—20。艾爾曼於《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提到：“杭州的詁經精舍和學海堂儘管試圖推進18、19世紀之際儒學教育的發展，但仍然是乾隆時期江南各地書院接受的漢學教育的代表和發展產物。”同樣指出學海堂的授課內容大抵移植自江南考據學而來。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91。

5 關於嶺南研究的相關書籍，科大衛（David Faure）曾著有《皇帝與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一書，考述嶺南歷史的流變以及帝國權力在嶺南一地的更迭與深化。科大衛（David Faure）著、卜永堅譯：《皇帝與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Steven B. Miles（麥哲維），“Upriver Journeys: Diaspora and Empire in Southern China, 1570–1850,” *Harvard Univ Council on East Asian*, 2017。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近年亦有嶺南文庫的建置，提供研究者嶺南研究之材料。陳柏言：《異物如何成為知識：論中晚唐嶺南異物書寫》，《中外文學》第50卷1期（2021年3月），頁19—60。

6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5。

7 吳蘭修為當時嶺南重要詞人，曾自云：“余隱桐村，素有詞癖。”見氏著：《桐花閣詞自序》，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冊2，頁774。陳澧《水龍吟》（詞仙曾駐峰頭）之詞序云：“余於此夜，與許青皋、桂皓庭（即桂文燦，1823—1884）登山”，記載與許玉彬出遊賞月，懷想師長吳蘭修，次韻吳詞的始末。黃國聲主編：《陳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冊1，頁647。

中(1796—1837),以及後來被譽為粵東三家的葉衍蘭、汪琬(1828—1891)與沈世良之外,陳澧(1810—1882)亦是其間所不可忽視者。⁸ 在此將陳澧作為考察道咸嶺南詞壇的基點,是著眼於學海堂為十九世紀以來廣東的學術與政治中心,其影響層面不僅止於經學考據與政治教育,學海堂課卷重視文學的傳統以及師生間緊密的交遊亦帶起了廣州詩詞結社的風氣。⁹ 陳澧為學海堂所培育出的第一代嶺南學人,於科舉失利後,先後擔任學海堂與菊坡精舍學長數十年。其學詞經歷上承學海堂第一代學長之張維屏與吳蘭修等人,¹⁰與前述的學友或同僚如汪琬、沈世良、葉英華、譚瑩、桂文耀,以及許玉彬等人也有詞集序跋題記或詞作點評等文獻材料留存。其學生輩如文廷式、汪兆鏞等人亦是晚清嶺南的重要詞人。陳澧作為道咸以降至民初的嶺南詞人的連結點,其地位不容忽視。其次,陳澧在治經考證之外,於當時嶺南亦有詞名。倪鴻(生卒年不詳)《桐陰清話》即曾記載當時珠江女錄事柳小憐頗好陳澧詞的軼事。¹¹ 又張維屏(1780—1859)以陳澧“詩詞不專主一家,而出筆能自抒胸臆”。¹² 譚獻

8 陳澧,字蘭甫,號東塾,自號江南倦客。其《東塾讀書記自述》云:“先世江南上元人(現江蘇南京)。祖考捐職早布政使司理問,遷廣東番禺。……文端公命入粵秀書院肄業,山長陳先生厚甫賞譽之。與桂星垣、楊浦香(1809—1874)為友,復問詩學於張南山(即張維屏,1780—1859)先生,問經學於侯君模(即侯康,1798—1837)先生。”(黃國聲主編:《陳澧集》,冊2,頁10。)道光十四年(1834),進入學海堂為專課生,道光二十年(1840)起先後出任學海堂學長與菊坡精舍山長數十年。陳澧生平尚可參考:容肇祖:《學海堂考》,《嶺南學報》第3卷第4期(1934年1月),頁40—43。以及李緒柏:《陳澧》(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1—11。

9 容肇祖《學海堂考》提到:“道光元年(1821)春,始倡學海堂課,於經義子史前賢諸集,下及選賦詩歌古文詞,示諸生以取舍之途,如詁經精舍例。……四年(1824)九月,復建學海堂於粵秀山半,十一月,堂成。”見氏著:《學海堂考》,《嶺南學報》第3卷第4期(1934年1月),頁14。

10 陳澧曾提到:“星垣(即桂文耀)為諸生,與余肄業粵秀書院時,監院吳石華填詞最有名,有小印文曰:‘嶺外詞人。’星垣笑謂余曰:‘彼可取而代也。’”年少的笑語固然不能當真,但也不難想見吳蘭修於當時嶺南的盛名。桂文耀:《席月山房詞》,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民國稿抄本第一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冊19,頁482。

11 倪鴻《桐陰清話》:“珠江女錄事柳小憐頗知書,喜讀番禺陳蘭甫孝廉澧詞。余嘗人日買舟招游花埭,時小雨初霽,姬至萃林園,逡巡不欲行。余詰之,對曰:‘怕行近,滑了穿花雙屐。’語。蓋孝廉《詠苔痕》句,可謂言語巧偷鸚鵡舌矣。”見氏著:《桐陰清話》(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1924年),卷7,頁3。

12 張維屏《藝談錄》語,轉引自陸有富:《文廷式詩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頁23。

(1832—1901)讚許陳澧“粹然大儒，不廢藻詠。填詞朗詣，洋洋乎會於風雅。乃使綺靡奮厲兩宗，廢然知反。”¹³諸如此類的評述，多是推崇陳澧能“以經術而為詞章”，¹⁴詞風“清新婉雅”而有深刻之致，能自成一家云云。¹⁵因此，以陳澧及其周邊文人的交遊為考察基點，即提供了我們理解道咸時期嶺南詞壇的途徑。過往論及嶺南詞學，或如管林等人所著的《嶺南晚清文學研究》，以鴉片戰爭前後的廣東文人詩詞勾勒“世變”與廣東民族意識的形成，強調文學作品的“詩史”或“詞史”等敘事面向。或以粵東文人個別生平著述為研究主軸，如左岩《粵東三家研究》，以沈世良、汪琬與葉衍蘭為研究對象，鉅細彌遺地考察三人的生平、作品特色與學術評價。惟前者多強調文人感時傷國的一面，尚未能區分詩詞兩者在題材與敘事方法的不同；後者則仍以傳統三家分述的形式開展，較難觸及廣東文人的身分認同與地域文化等概念。接著，部分學者或從文學史之角度著眼，嘗試從文學流變之觀點建構嶺南文學譜系。如陳永正《嶺南文學史》一書即囊括了漢魏六朝至清末民初嶺南文學的各種體類，包括詩詞散文外，南音、木魚與粵謳等。惟因文學史的寫作限制，詞學部分僅能列舉重要詞人，難以深論政治社會的背景變遷對嶺南詞的發展與影響。謝永芳《廣東近世詞壇研究》是近年少數留意到廣東詞壇的專著。然或因撰寫當時文獻資料有限，內容大多為文獻梳理，未能深入處理詞人的文化背景與交遊等層面。¹⁶近年因《廣州大典》、《清代詩文集彙編》與《清詞序跋彙編》等文獻材料的出版與廣東地域研究的興起，嶺南詞學的相關研究也日益蓬勃。如李曙光《姜張詞

13 譚獻亦提到：“嶺南文學，流派最正……填詞有陳蘭甫先生，文儒蔚起，導揚正聲。”譚獻：《復堂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冊4，頁4017、4019。

14 陳聲聰《閩詞談屑》評謝章铤“以經術而為詞章，與南海陳蘭甫巍然相峙。”將陳澧與謝章铤相比，以為兩人既為經師，亦兼有詞章之作。見陳聲聰：《填詞要略及詞評四篇》（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50。

15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澧詞雖多少年之作，而清新婉雅，持律亦不苟。”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冊13，頁622。

16 可參見：管林、陳永標等：《嶺南晚清文學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55—72、127—211。左岩：《粵東三家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陳永正：《嶺南文學史》（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謝永芳：《廣東近世詞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87—235。

風流播嶺南論述》、范松義《清代嶺南越臺詞社考論》及《清代嶺南與嶺外詞人交遊考論》等文,初步提供了理解嶺南的詞學宗尚與交遊結社之綫索。¹⁷ 陳澧的詞學成就也因此為學者所關注。梁守中《陳澧的〈憶江南館詞〉與〈白石詞評〉》與王偉勇、林淑華《陳澧〈論詞絕句〉六首探析》,初步梳理了陳澧的詞學取向。¹⁸ 拙著《試論陳澧之詞學觀——以新見抄本為中心》則以陳澧手批《絕妙好詞箋》之批語為中心,補充了前行研究因文獻不足未能論斷之處。以為陳澧雖然學宗浙西,但論詞卻能不受浙西門徑所囿。¹⁹ 惟因題目所限,僅處理了陳澧的詞學宗尚,並未觸及道咸時期嶺南詞壇的整體詞風。

奠基於此,本文以陳澧的出身背景與其周邊文人的詞學交遊與相關序跋題記為基礎,試圖勾勒道咸時期嶺南詞壇的整體趨向。首段闡述嶺南文化身分建構的過程。梳理嶺南文人接受江南文化的背景脈絡,藉以理解嶺南詞學審美與文化認同之來源。接著從陳澧曾參與的詞學活動著眼,如越臺詞社之集結、厲鶚詩文的流傳與閱讀,以及陳澧自身的詞學交遊樣態等,觀察當時嶺南詞風宗法之所在。希冀從文化受容與建構的角度,透過嶺南文化形成、詞學受容與文人交遊等層面的討論,能更全面且細緻地把握道咸時期嶺南詞壇的概況。

需先說明的是,本文不以“晚清”,而以“道咸時期”為題,除因詞學對晚清之範圍未有共識以外,是由於陳澧晚年縱然還有零星詞作,但主要的詞學活動時期多落在道咸時期至同治初年(1827—1865 前後),與史學界以 1840 為分界

17 詳見:李曙光:《姜張詞風流播嶺南論述》,《北京社會科學》2019 第 1 期,頁 55—64。范松義:《清代嶺南越臺詞社考論》,《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3 期,頁 89—93、155。范松義:《清代嶺南與嶺外詞人交流考論》,《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4 期,頁 12—17。

18 梁守中:《陳澧的〈憶江南館詞〉與〈白石詞評〉》,《嶺南文史》1999 年第 1 期,頁 43—45。王偉勇、林淑華:《陳澧〈論詞絕句〉六首探析》,《政大中文學報》第 7 期(2007 年 6 月),頁 83—114。近年又有范松義:《陳澧〈憶江南館詞〉簡論》,《廣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2 期,頁 52—56、謝永芳:《陳澧的詞學研究》,《東莞理工學院學報》2007 年第 4 期,頁 81—86、陸有富:《陳澧詞學觀探論》,《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2 期,頁 65—70。

19 關於陳澧詞學觀的討論,可參見拙著:《試論陳澧之詞學觀——以新見抄本為中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63 期(2016 年 7 月),頁 203—234。

的共識不同。²⁰ 其次，此處稱“嶺南詞壇”而非嶺南詞派或學海堂詞派，是由於詞派(school)的形成是以特定之詞人群體，主觀上具備詞派結成的認識與自覺；客觀上具備完整的詞學理論主張與審美典範，以及相應數量的創作或總集的編成。惟道咸時期的嶺南詞人並未有詞派集成的自覺與明確的詞學主張，故在此不稱嶺南詞派，而以嶺南詞壇概括。

二、文化身分的建構：由“江南”至“嶺南”的轉折

(一) 巍然高館憶江南——“江南”的文化鄉愁

陳澧先祖源自江南，其《東塾讀書記自述》即大致交代了家族遷居粵地之過程，他說：“先世江南上元人（現江蘇南京）。祖考捐職早布政使司理問，遷廣東番禺。”又，《送劉學使序（按：即劉熙載，1813—1881）》亦有：“家本金陵人，距先生之居數百里，如其身健時平，歸掃墳墓，遂渡江而北，踵先生之門，以續今日相見之樂，誠快事也。”²¹ 陳澧先人由金陵入粵，至陳澧始占籍番禺。然由於先人塋墓並未遷葬粵地，回鄉掃墓至陳澧這一代仍為

20 詞學界除對“晚清”的時代劃分頗不一致外，“晚清”的概念也多與常州詞派的比興寄託之說相連，與嶺南詞學的發展情況略有參差。或有學者遵循歷史學或政治史上鴉片戰爭之概念，以1840—1911的七十年間為晚清。或如孫克強《清代詞學》以“道光、咸豐之際，常州詞派老一代的代表人物漸次辭世。……新一代的詞學活動主要在同治以後，此即通常所稱的晚清。”（見氏著：《清代詞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321。）或如嚴迪昌《清詞史》將道、咸、同、光、宣五朝的詞人皆納入晚清的範疇，不再區分道光前後期。見氏著：《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535—539。再者，就嶺南詞之分期，范松義以“鴉片戰爭以後至光緒初年，嶺南詞人大多接受浙西詞風，至清末民初，嶺南詞壇則為常派牢籠，詞人創作多以常派的詞學理論為準的。”見氏著：《清代嶺南的詞學家族與家族詞學》，《東莞理工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頁67。謝永芳認為近世廣東詞壇可分為三期，前期：嘉慶2年（1797）至道光20年（1840），浙西詞派主導，代表詞人為吳蘭修、儀克中；中期：道光20年至民國8年（1919），由浙轉常，代表詞人為粵東三家及陳澧；後期：民國8年至37年（1948），在常州詞派的基礎上進行創造。見氏著：《廣東近世詞壇研究》，頁34—35。李曙光則以學海堂為中心，將嶺南浙西詞風的傳播分為三期：嘉、道：吳蘭修、儀克中；道、同：陳澧；咸、光：粵東三家。見氏著：《姜、張詞風流播嶺南述論》，《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頁55—64。

21 黃國聲主編：《陳澧集》，冊1，頁107。

家族的重要行事。²² 此一儀式象徵著陳澧的江南原鄉在此並非虛設的想象,而是能夠以具體的行動實踐加以連結與記憶者。正因如此,陳澧的衆多文稿中不時可見出身江南的自我描述。如其自云:“江南倦客者,余昔年填詞以此自號”、²³為友人題詞與自身詞集序跋署名“江南倦客”,²⁴或在書畫落款署名為“鍾山陳澧”(按:鍾山為南京舊稱)。²⁵ 甚至曾請阮元為書房題字“憶江南館”等,皆為陳澧不忘江南此一文化身分的顯例。

江南不僅是陳澧內在“永恒的鄉愁”,同樣也是當時衆多嶺南文人先祖的原鄉所在。如與陳澧交好的汪琬、桂文耀(1806—1854)、²⁶ 沈世良(1823—1860)²⁷ 與徐灝(1810—1879)²⁸ 與譚瑩(1800—1871)²⁹ 等人,先世皆是從江南一帶移居嶺南者。這批人或先祖較早至粵,已入粵籍,或至陳澧這一代(移民第三代)始入籍廣東成為捕屬人。³⁰ 由於這一層緣故,他們對“江南”這個先祖

22 桂文耀任淮海兵備道任內,亦曾保住了陳澧先人的塋墓不受太平軍毀壞。陳澧《曾祖妣韓宜人墓告示碑陰記》云:“桂君與澧為友,相愛若昆弟,又推愛於我先人,保其丘墳。”同上,冊1,頁525。

23 同上,頁602。

24 陳澧《小游仙詞題詞》文末亦有“江南倦客讀畢并題。”同上,頁383—384。

2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陳蘭甫先生書畫特展目錄》(臺北:臺北“故宮博物院”,1979年),頁7、99。

26 桂文耀,字子淳,號星垣。先祖由浙入粵擔任幕僚,至祖父桂鴻才改南海籍。中國地方志集成編輯工作委員會:《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番禺縣續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卷20,頁252。

27 沈世良,字伯眉,番禺捕屬人。所謂“捕屬”,清代廣州市為南海、番禺兩縣所分轄,兩者以城中為界,以西屬南海,以東屬番禺。遊宦廣州的外地人,若居住日久,子孫未回原籍,即得向縣衙稟報申請入籍,成為捕屬(即歸入捕所管轄)。此處說明可參見:廣州市政協門戶網站 http://www.gzzxws.gov.cn/qxws/lwzs/lwzj/lwd_5/201012/t20101206_19959.htm。

28 《番禺縣續志》載:“徐灝,字子遠,一字伯朱,自號靈洲山人。原籍浙江錢塘,先世游幕留粵,遂占籍番禺。”中國地方志集成編輯工作委員會:《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番禺縣續志)》,卷21,頁272。

29 《南海縣志》載:“譚瑩,字兆仁,號玉生,南海捕屬人。幼穎悟,於書無所不窺,而尤長於詞賦。”王等修、梁紹獻等纂:《南海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頁310—311。

30 清代戶籍與科舉名額相關,移民至其他省份的人員須至第三代始可改換籍貫,取得科舉資格。以汪琬為例,其先人由浙入粵,至光緒元年(1875)入籍番禺捕屬司,始正式落籍廣東。在入籍前,他對自己的客籍身分亦頗有意識,曾云:“我居廣州久,視之如故鄉。”廣州對汪琬而言僅是近似故鄉的居所,而非內在心靈真正認同的文化原鄉所在。《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冊1558,頁613。

原鄉所在，也始終帶有孺慕的眼光。因此，當來自江南的考據學大儒阮元至廣州設置學海堂時，自然容易得到這批嶺南文人的歡迎。他們對於江南學術的渴求以及考據學方法的習得也成爲了他們理解與貼近“江南”的方式。麥哲維曾歸納陳澧的“江南”情結爲：“對陳澧而言，如同其他學海堂的學者，考據學的進展與江南的關係盤根錯節。身爲第二代學海堂學者，陳澧有著許多前代學人的特點，在於他屬於主導了學術生命的廣大僑居者與移入者社群之一部分。陳澧數度嘗試跨越江南與廣州這兩個世界，然而他所關注者仍舊是江南。”³¹學海堂提供了以陳澧爲主的這批嶺南文人承繼、會通與延展江南與廣東學術文化（尤以經學爲主）的場域，他們通過江南考據學的訓練嘗試回應並與江南學術對話。誠然，由學術受容與方法來看，陳澧的學術關心與江南始終綿密。但如從文化身分的建立與文學接受來看，這群帶著江南背景的嶺南文人積極吸收嶺南文化的內涵，試圖理解、反芻與會通兩地，以確立並形塑嶺南學術的地域特性。隨著浙西學術勢力於嶺南的深化，浙西文學，乃至於詞學的審美品味也受到了嶺南文人的接受與喜好，成爲文人創作與品評的基礎。

誠如張景祁（1827—？）《嶺南三家詞鈔序》對嶺南詞人的觀察：“三君（汪琬、葉衍蘭、沈世良）皆系出鑑湖，徙居嶺嶠。……結蓴夢以興謳，鄉音未改……宜乎與浙西六家如燕之頡，如驂之靳，正不獨蠻烟蜚雨間各顯一席也。”³²鑑湖爲浙江紹興之名勝；蓴夢，蓴菜爲江南特有之物產，在此即指三家先祖皆出身江南之事。以爲三家雖遷居嶺南，詞風卻仍帶浙西風致，而得以與浙西六家相提並論。即便這批先祖來自江南的嶺南文人移民後代與原鄉已經斷開了戶籍上的聯繫（即入籍廣東成爲捕屬人），但源自家族的文化認同卻無法輕易割捨。江南學風於嶺南得以迅速傳播並爲人所接受，與此種文化內緣因素亦有關聯。此外，序文也暗示著：即便三家源自江南，嶺南詞學亦在化外之處開展了自身的形成路徑，足以與浙派相提並論。

31 Steven B. Miles, “The Sea of Learning: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34.

32 張景祁：《嶺南三家詞鈔序》，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冊4，頁1794。

(二) 嶺南詞學的追溯——《粵東詞鈔》的成書

學海堂的建立將江南的學術文化直接帶入嶺南，給予了新的學術刺激之餘，也促使這批嶺南文人重新思索面對“江南”所代表的優勢文化之際，應如何確立嶺南的文化位置與建構文化身分。這種“文化身分”(cultural identity)的形塑與學術主體意識的生成，³³在這群嶺南文人的實踐中，即是以地方歷史的撰述、詩作的在地元素與嶺南相關書物的蒐集與編輯，表現嶺南歷史文化與風土景物的特殊性。麥哲維將此種過程稱之為“文化地景之重塑”(reshaping the cultural landscape)。歷史考察作為考據學重要學術訓練之一環，南漢史事的考辯在此正是展現學人考據功力的絕佳課題。學海堂初代學長吳蘭修(1789—1839)即以五代十國的南漢為對象，³⁴而有《南漢紀》、《南漢地理志》與《南漢金石錄》等成果。其他曾任學海堂學長的學人，如梁廷枏(1796—1861)亦有《南漢書》傳世。學海堂人意圖通過對嶺南歷史的追溯和梳理，建構嶺南地域的獨特性的用心頗為鮮明。

這種對於南漢歷史地景的重視，亦見於學海堂人的詩詞吟詠。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於學海堂所在的粵秀山原本即是南漢故址，周邊歷史地景自然是文人出遊吟詠的最佳取財。“呼鸞道”為學海堂諸人時常相約遊賞之處。陳澧即曾與友人陳良玉同尋呼鸞道，並分別以《臺城路》此一詞牌同調唱和之記錄。³⁵“呼鸞道”相傳在粵秀山越王臺故址下，“南漢劉龔疊石為道，名曰呼鸞

33 Steven B. Miles, “The Sea of Learning: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 pp.127 – 163.

34 南漢為唐末五代十國期間，劉隱以番禺（現廣州）為中心，照搬中原王朝的統治模式建立的國家。科大衛曾提到：“南漢朝廷的高級官員，似乎都來自嶺南本土的士紳階層，儘管不一定。是產生於珠江三角洲，甚至不一定產生於廣州。這些南漢高官中。有少數宣稱祖籍北方，但也承認他們的家族已在南方定居兩至三代之久。”從王國的建立至人才的任用，南漢可以說是年代最早，官員來源組成更趨純粹的“嶺南”政權。科大衛（David Faure）著、卜永堅譯：《皇帝與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頁29。

35 陳澧有《臺城路·尋呼鸞道故址不得》（短筇粵秀山前路）一詞，而陳良玉以《臺城路》（昌華苑外紅雲散）同調詞為和。見黃國聲主編：《陳澧集》，冊1，頁658。

道。夾道栽甘菊芙蓉與群臣遊宴，又名‘遊臺’。”³⁶另一處“荔枝灣”於顯德園內，爲南漢後主劉鋹所建之昌華苑的一部，³⁷爲當時帝王設宴之所。陶穀《清異錄·果》亦提到：“嶺南荔枝固不逮閩蜀，劉鋹每年設紅雲宴，正荔枝熟時。”³⁸甚至越臺詞社據以成立之越王臺，也是隸屬於南漢的疆域範疇。³⁹另一方面，學海堂人將考據學應用在廣東金石史料的考索與整理，以廓清嶺南歷史沿革並確立文化認同。道光二十九年（1849）《粵東詞鈔》的編纂與成書，即可視作學海堂人試圖通過歷史記錄與金石碑銘從文學層面建構地方認同的成果。請看張維屏《粵東詞鈔序》：

詞一名詩餘，談藝者多卑之。余謂詞家所填之詞，有高有卑，而詞之本體則未嘗卑。何也？詞與詩皆同本於三百篇者也。……粵東地位南離，人文炳煥，聲詩之道，自唐以逮國朝，大家名家，後先相望，總集別集，遠近風行。惟詩餘則千載以來從未有人搜羅而甄綜之。吾友許君青皋、沈君伯眉，好古多聞，尤深詞律。一日偶談及此，兩君慨然任之。於是近覽遠稽，探幽索隱，或訪諸他鄉異縣，或求之斷簡殘編。人無論歿存，詞無論多寡，自五代迄今，共得六十餘家。分之則各自成篇，合之則都爲一集。雕版將竣，問序於余。余因約舉詞字多寡，詞句短長，皆本於三百篇，以明詞體之未嘗卑。先以質諸同人，且以質諸海內之工於倚聲者。⁴⁰

36 陳良玉之唱和詞與呼鸞道之說明均見於：中國地方志集成編輯工作委員會：《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番禺縣續志）》，卷41，頁561。

37 屈大均《廣東新語·宮語》載：“又五里有荔枝灣，僞南漢昌華故苑，顯德園在焉。”見：屈大均：《廣東新語》，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冊4，頁427。

38 陶穀、吳淑著：《清異錄 江淮異人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35。

39 就南漢與十九世紀嶺南文人之關係，可參考：Steven B. Miles, “Rewriting the Southern Han (917 – 971): The Production of Local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2.1 (2002), pp.39 – 75.

40 陳建華、曹淳亮主編：《廣州大典》（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冊520，頁425—426。

《粵東詞鈔》作為嶺南第一本通代詞學總集，實具有標誌性之意義。《詞鈔序》開頭承繼了清初以來尊體說的脈絡，明確指出粵東詩學的源流悠長，不僅前代名家輩出，後繼者亦踵續而至。相對於此，粵東詞學始終不盛，也沒有詞學總集或選本的相關編著，直到許玉彬與沈世良求訪輯錄上起南漢，下迄國朝（清代）的《粵東詞鈔》，嶺南詞學的源流與雛形始告確立。⁴¹

由《粵東詞鈔》目錄所收的作家來看，名列卷首的是僅收錄一闕詞的五代南漢的黃損，接著是宋代的崔與之、劉鎮與葛長庚等 6 人共 98 首，明代陳獻章、屈大均、陳恭尹等 13 人共 167 首，最後為詞作數量最多，收錄 46 人共 780 首的國朝詞人。編者特意以南漢詞人為卷首，既是與學海堂人通過金石考據追溯嶺南歷史淵源至南漢的舉措相互對應，將嶺南詞學上溯至五代，亦是欲彰顯嶺南詞學傳統之悠久。其次，《粵東詞鈔》所收的清人作品以學海堂及其相關的文人為多，如張維屏詞 47 首、儀克中 36 首、吳蘭修 59 首、譚敬昭（1773—1830）44 首、⁴²黃德峻（1796—1850）88 首、⁴³譚瑩 12 首、陳澧 8 首等人的作品即佔了

41 陳澧《許青皋墓碣銘》載：“（許青皋）與其友沈伯眉選《粵東詞鈔》若干卷。又為填詞社，觴詠為樂。”黃國聲主編：《陳澧集》，冊 1，頁 248。其中又以沈世良對此用力最深。譚獻《粵東三家詞鈔序》夾注云：“伯眉定《嶺南詞》。”譚獻：《粵東三家詞鈔序》，馮乾輯校：《清詞序跋彙編》，冊 4，頁 1794。

42 譚敬昭（1773—1830），字子晉，號康侯，廣東陽春人。與張維屏、黃香石交好，為翁方綱許為“粵中三子”。著有《聽雲樓詩鈔》、《聽雲樓詞鈔》。據拍賣網站說明所示，“《聽雲樓詞鈔》書首有題記云：‘聊付雙鬟低唱，敢希三影齊名。’譚敬昭對其詞作頗為自負，自謂頗有宋代詞家張先‘三影’之才情風致。”又劉德琯《校〈聽雲樓詩鈔〉記》載：“先生別有詩餘二卷，《珠江柳枝詞》一卷，先生未通籍時早已刊板行世。原稿無之，故仍舊與詩集分行。”（劉德琯：《校〈聽雲樓詩鈔〉記》，譚敬昭：《聽雲樓詩鈔》，〔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藏，道光二十一年本〕，卷 1，頁 3 下。）由於譚氏詞集於 1817 年進士及第前已刊刻通行，而沈世良編選《粵東詞鈔》的動機既是為了粵地詞人存詞，對前輩詞人選詞較多亦為自然。惟其詞集《聽雲樓詞鈔》流傳極少，不見於近年出版的各類清人文獻總集，現僅見海王村 2021 年秋季書刊資料文物拍賣會的陳蒙庵舊藏。<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0101490234/> 雅昌藝術網。

43 黃德峻（1796—1850），字景崧，號琴山，廣東高要人。黃氏與十三行怡和行商伍崇曜兄弟相熟，曾寄寓伍氏西園，與學海堂諸人關係亦密切。喜好收藏書法名畫，收藏頗豐。黃氏擅於作詩，譚瑩謂其詩有漸近自然者。又以倚聲擅揚，佳者與吳蘭修《桐華閣詞》雁行。著有《樵香閣詩鈔》、《三十六鴛鴦館詞》。湯鵬《海秋詩集》曾有《讀黃琴山農部三十六鴛鴦館詞》詩。詞集現今未見，僅剩《粵東詞鈔》所收錄者。黎細玲編：《香山人物傳略（一）》（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 年），頁 629。

四成以上。⁴⁴ 此外，曾任學海堂學長的譚瑩（1800—1871）於專論唐宋詞人的《論詞絕句一百首》外，尚有三十六首專論嶺南詞人與四十首論國朝詞人者。其中《論詞絕句》（專論嶺南詞）與《粵東詞鈔》相同，都將南漢的黃損置於卷首，而其所選取的國朝嶺南詞人也多與《粵東詞鈔》重疊。⁴⁵

要之，《粵東詞鈔》的編纂可以視為學海堂人利用考據學之方式追溯嶺南詞學過程，將嶺南詞學之濫觴定於南漢，除與嶺南歷史得以相互觀照外，同時也確立了嶺南詞學的發展譜系。⁴⁶ 而於此一過程投注了莫大心力的學海堂文人及其周邊人士，也成為了道咸時期“粵東/嶺南”詞壇發展的重要代表。

三、陳澧與嶺南詞人之交遊

（一）詞體創作意識的凝聚與影響——越臺詞社的集結

交遊結社為傳統文人重要的交際型態，或為逸樂歡會之助興，或為文士彼此互爭軒冕、競馳才氣的場域，皆是通過此一活動確立詞人群體間共通的詞學品味。嶺南詩詞結社風氣之興起與學海堂雅集傳統關係頗為密切。據《學海堂志·雅集》記載：“築堂以來，歲有小集，講禮於斯，會友於斯。”⁴⁷ 學海堂的“雅集”原是以阮元壽辰為始，配合學海堂四季課卷，後逐漸演變為上巳、中秋等節令時堂內師生的固定聚會。目的是於經義教授外，尚能培養學生文學的情意感知並聯絡師生情誼。以學海堂文人為主要成員的越臺詞社、花田、訶林以及山

44 《粵東詞鈔》目錄可參見：陳建華、曹淳亮主編：《廣州大典》，冊 520，頁 426—428。

45 譚瑩《論詞絕句》（黃損）：“竟傳仙去亦多情，得近佳人死也榮。誰謂益之能直諫，生平願作樂中箏。”譚瑩：《樂志堂詩集》，卷 6，《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606，頁 385。又《箏柱》一詩的詩後小注亦有：“‘生平願作樂中箏，便死也為榮。’南漢時粵人黃損詞也。”譚瑩：《樂志堂詩集》，卷 11，同上，頁 450。

46 潘飛聲（1858—1934）《論嶺南詞絕句二十首》第一首也有：“尚書極諫有時名，底願生平作樂箏。要近佳人纖手子，神仙不過是多情。”同樣延續了《粵東詞鈔》所確立的嶺南詞學發展譜系，將南漢黃損列為首位。程郁綴、李靜：《歷代論詞絕句箋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534。

47 黃國聲主編：《陳澧集》，冊 5，頁 671。

堂詞社等即此一雅集下的衍生聚會。⁴⁸ 其中對道咸時期嶺南詞學影響最甚，即為越臺詞社。據《廣州府志》載：“（黃玉階）以粵東詞學頗少專家，約諸詞人於學海堂，創為詞社。選題校藝，排月舉行。”⁴⁹ 又陳良玉《桐花閣詞序》亦云：“往道光壬寅（1842）、癸卯（1843）間，同人結詞社於羊城，月凡一會，唱和甚盛，惜學博不及見矣。”⁵⁰ 此處的“學博”即為啟發了陳澧等學海堂人填詞興趣的吳蘭修。至道光年間，黃玉階等廣州出身的文人有鑒於粵東詞學不盛，希冀詞社定期的集結聚會，相互交流切磋以精進詞藝，提升粵東填詞之風氣與作品水準。可惜的是，原本僅是詞學同好藉以交流的聚會，卻因“俗客闖入，競設盛饌，冠蓋赫然”，⁵¹ 逐漸淪為有心人士的交際場所，於是詞社“乃恚而罷”，五會之後戛然而止。

縱然越臺詞社為期不長，其中的與會者卻幾乎囊括了當時廣州最知名的文人。如當時頗富詞名的葉英華（1802—1865）、陳澧學海堂的同僚許玉彬、徐灝、譚瑩、沈世良等人皆為詞社之成員。陳澧的詞學歷程也因詞社的結成而有所轉折。誠如《憶江南館詞自序》所言：

余少日偶為小詞，桂星桓（即桂文耀）見之曰：“此詩人之詞也。”自是十餘年不復作，或為之，歲得一二闕而已。去歲黃君蓉石、許君青皋邀為填詞社，凡五會，而余僅成二詞。兩君謂余真詞人也。此三君皆工詞，而其言如此。蓋詞之體與詩異，詩尚雅健，詞則靡矣。方余學為詩，故詞少婉

48 《番禺縣續志》載：“（沈世良）工詩，尤善填詞，咸豐癸丑（1853）、甲寅（1854）間與譚瑩、金錫齡，許其光結山堂吟社。復與張深、黃玉階、許玉彬、李應田、葉衍蘭結花田、訶林諸詞社。”中國地方志集成編輯工作委員會：《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番禺縣續志）》，卷29，頁245。

49 戴肇辰等修、史澄等纂：《廣州府志》（廣州：光緒五年粵秀書院本），卷131，頁31下。類似的見解尚有吳嵩梁《桐花閣詞序》：“嶺南故多詩人而少詞人。”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冊2，頁773。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亦云：“粵東詞家甚少，近日嘉應吳石華、番禺儀墨農，始以詞名。”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3，頁2809。又，梁梅《論詞絕句六首序》：“念曲江詩派，不乏名家，惟嶺南詞壇，尚稀宗匠。”孫克強、楊傳慶、裴喆編：《清人詞話》，頁1476。同樣論及嶺南詞學始終不盛，須至嘉慶、道光以後纔逐漸興起。

50 陳良玉：《桐花閣詞序》，馮乾輯校：《清詞序跋彙編》，冊2，頁776。

51 陳澧《許青皋墓碣銘》提到詞社罷散的原因為“俗客闖入，競設盛饌，冠蓋赫然。”黃國聲主編：《陳澧集》，冊1，頁248。

約。今十餘年不學詩久矣，或可以為詞歟？然亦才分薄耳。昔之詩人工詞者豈少耶？今年下第歸，行篋書少，鉛槧遂輟。江船雨夜，稍稍為詞，以銷旅愁。時方以廣文待選，取杜詩語題之曰《燈前細雨詞》，並舊作都為一卷。甲辰（1844）新秋章貢舟中識。《憶江南館詞自序》⁵²

許青皋（1810？—1859？），即許玉彬。許氏擅長詞章，為越臺詞社之召集人，與陳澧曾有《綠意·苔痕·次陳蘭甫韻》（銀牀暗積）等唱和之作外，也曾與沈世良合編《粵東詞鈔》。⁵³《自序》為陳澧於甲辰秋日（1844），中年下第南歸的途中，因江船雨夜致生羈旅窮愁之感所作。其中提到《憶江南館詞》是甲辰（1844）越臺會後隔年，陳澧點檢三十五歲之前舊作所成之《燈前細雨詞》為底本，加上其後所填製的少數詞作增補而成的詞集。⁵⁴ 陳澧早年填詞曾被友人桂文耀戲稱為“詩人之詞”。⁵⁵ 直至越臺唱和時，即便陳澧詞作不豐，卻受到了詞社成員的好評，建立了他的填詞自信之餘，也影響了《憶江南館詞》的成書與日後詞學交遊的人際網絡。

詞 人	詞 作
陳澧	《鳳凰台上憶吹簫·越王臺春望·癸卯二月越臺詞社作》（芳樹啼鵑）、《綠意·苔痕·越臺詞社作》（空庭雨積）
葉英華	《一枝春·酒帘》（紅飈斜陽）、《鳳凰臺上憶吹簫·越臺春望》（綠樹啼鵑）、《南浦·帆影》（天闊渺愁余）、《綠意》（濛濛綠地） ⁵⁶

52 黃國聲主編：《陳澧集》，冊1，頁643。

53 許玉彬之生平均未見於《歷代詞人考錄》、《清人別集總目》等書。謝永芳將其卒年訂於1860以前，惟沈世良卒於1860年正月，又曾囑咐陳澧為許青皋作墓誌銘，許玉彬卒年或訂為1859年以前較為適切。此處生卒年參考自：謝永芳：《清代民國廣東詞人生卒年考正》，《文獻》2008年第1期，頁38—39。

54 《憶江南館詞》另外一部分詞作則為癸丑（1853）時，以“賊（太平天國）據金陵，以先世為上元人，凡甲辰以後所為詞，雖無多篇，並前作題曰《憶江南館詞》，以寄思念故鄉之意。”黃國聲主編：《陳澧集》，冊1，頁647。

55 同上，頁643、169。

56 分見於：葉英華，《花影吹笙詞鈔》（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光緒三年羊城刻本），卷1，頁14—17。

續 表

詞 人	詞 作
許玉彬	《南浦·帆影》(一葉壓秋江)、《鳳凰臺上憶吹簫·越王臺春望》(北郭峰迴)、《綠意·苔痕·次陳蘭甫韻》(銀牀暗積) ⁵⁷
徐灝	《一枝春·酒帘》(北郭青山)、《綠意·苔痕》(積陰幽暢)、《南浦·帆影》(風緊峭帆張) ⁵⁸
譚瑩	《綠意·苔痕》(蕭閒此局) ⁵⁹
沈化杰	《一枝春·酒帘》(驀爾擡頭)、《南浦·帆影》(有客正登樓) ⁶⁰
梁香浦	《綠意·苔痕》(雨滋翠積)、《掃花遊·花市》(花村市近) ⁶¹
陳其錕	《掃花遊·花市》(衆香國裏)、《一枝春·酒帘》(影弄風柔)、《鳳凰臺上憶吹簫·越臺春望》(師國樓船)、《綠意·苔痕》(庭陰蘚積) ⁶²
沈世良	《綠意·苔痕》(蒼雲碎翦) ⁶³
黃蓉石	未見,詞集散佚。

從上表的詞牌與詞題來看,越臺唱和的詞作是以同題共作形式的詠物詞為主,如花市、酒帘、帆影、苔痕等,頗見南宋結社的詠物之風。其中所使用的詞牌如《綠意》,即是張炎改易白石《疏影》而來。⁶⁴其餘如《南浦》、《一枝春》與《掃花遊》等詞牌,亦為張炎所好用者。即便越臺詞社的成員並未表明群體的審美偏好所在,從其創作也能看到他們繼受浙派尊南宋、好姜、張的傾向。

總之,越臺詞社為道咸以來嶺南較具規模且有記錄的文人詞學唱和活動,

57 許玉彬:《冬榮館遺稿》,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冊22,頁423—424。

58 徐灝:《攬雲閣詞》,《廣州大典》,冊520,頁173—174。

59 葉恭綽:《全清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109。

60 沈世良、許玉彬編:《粵東詞鈔》,《廣州大典》,冊520,頁604。

61 同上,頁541。

62 同上,頁107—108。

63 同上,頁297。

64 張炎《紅情》(無邊香色)詞下小題云:“《疏影》、《暗香》,姜白石為梅著語。因易之曰紅情,綠意以荷花荷葉詠之。”張炎撰、吳則虞校輯:《山中白雲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06。

標誌著粵東詞學之興起，亦爲與會的嶺南詞人奠下詞學交流的人際網絡。即便詞社爲期不長，其間的唱和詞作也成爲了《粵東詞鈔》收錄的重要來源。陳澧的填詞自信與日後的詞學交遊亦是得益於越臺詞社的集會。

（二）群體的審美指標——厲鶚詩詞文集的閱讀與流傳

江浙一帶於道咸時期雖然已漸爲常州詞學所籠罩，惟嶺南位處僻地，學術信息往來不易，與江浙學術中心仍有學術接受的時間差。因此，縱然道咸時期江浙一帶常派勢力已逐漸抬頭，嶺南一帶的詞人仍多崇尚浙西風味，在陳澧之前，吳蘭修、儀克中與人稱“浙派殿軍”郭麐（1767—1831）即有往來記錄。⁶⁵ 陳澧於吳蘭修辭世後多次尋訪其《桐花閣詞》刻本，並囑託陳良玉校定後收入《學海堂叢書》一事，⁶⁶更是學海堂承繼浙西詞學品味的象徵。浙西詞派崇尚姜、張，以朱、厲爲宗，其中又厲鶚詩文詞集的流通與閱讀，於此時期成爲了嶺南文人群體間的交流基礎。與陳澧交好的沈世良、汪琬與潘恕等人即有不少相關記錄。

曾任學海堂學長的沈世良爲道咸時期嶺南知名詞人。其詞題詞序中對以樊榭詞韻與人唱和，或讀樊榭詞集之事多有記錄。如《百字令·立齋晚泊滄江，登三十六樓，再用樊榭韻填寄索和，爲賦此解》（斜陽導客）及《百字令·與立齋弟夜酌，讀樊榭詞集，用集中過七里灘韻同賦》（翛然琴趣）兩首即爲代表。⁶⁷ 汪琬於《讀樊榭山房詩集四首》稱頌樊榭詩“澹到無痕清有骨”外，⁶⁸汪

65 如郭麐即曾爲吳蘭修《桐花閣詞》與儀克中《劍光樓詞》作序，可見道光年間浙西詞人與廣東詞人的往來情形。見馮乾輯校：《清詞序跋彙編》，冊2，頁773、928。

66 《桐花閣詞》的成書時間早於學海堂成立之前，陳澧尋訪過程亦頗費苦心。陳良玉於光緒七年（1881）《桐花閣詞序》即陳述了這一段經歷，他說：“粵稱詩國，惟詞寥寥。嘉應吳石華學博史學擅長之外，獨工倚聲。身後遺書散失，其詞亦罕流傳。家蘭甫先生極稱許之，搜訪得前後兩刻本。以余謬有同嗜，屬爲校訂，重刊入《學海堂叢書》，乃去其重複，並汰其什之一二，得若干闕爲一卷，名仍其舊。”馮乾輯校：《清詞序跋彙編》，冊2，頁776。

67 沈世良、許玉彬編：《粵東詞鈔》，陳建華、曹淳亮主編：《廣州大典》，冊520，頁299。

68 汪琬：《隨山館猥稿》，卷3，《隨山館全集》（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光緒十年本），頁9下。

琬自身詞作也有“色色皆似樊榭”之譽。⁶⁹ 又,葉英華以《法駕導引》詞牌所填製的《小游仙詞》百首,或即源自於厲鶚《游仙百詠》之作。⁷⁰ 陳澧有題詞云:“夢禪居士見示《小游仙詞》百章,此真所謂裁雲縫霧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聲。”⁷¹ 陳澧《與潘鴻軒書》之四也有“奉贈《樊榭詩文集》六冊,其詞集若覓得,並送上。”又其曾評沈世良《人月圓·花朝》(東風吹瘦簾波影):“樊榭云:‘偶然燕語人無語,心折長蘆小釣師。’不知見此又何以也。”⁷² 甚至與陳澧同為學海堂學長的陳璞(1820—1887)也曾為光緒七年(1881)二月嶺(按:應為“嶺”)南述軒重刊《樊榭山房集》題字。不難想見厲鶚詩詞於當時嶺南的流傳盛況。

其次,厲鶚《論詞絕句》確立了以絕句評述詞作風格或詞集文獻的新批評形式,嶺南詞人受流風所及,亦有不少論詞絕句之作。⁷³ 如沈世良《案頭雜置諸詞集戲題四絕句》,⁷⁴ 其中提到辛棄疾、蘇軾、朱彝尊、陳維崧、納蘭性德、王沂孫、厲鶚以及郭麐等八家,其中朱、厲為浙西宗主,郭麐亦是晚期浙派中堅。⁷⁵ 譚瑩《論詞絕句》(論國朝詞人)也提到浙西六家的朱彝尊、龔翔麟(1658—1733)、李符(1639—1689)、沈皞日(1637—1703)、沈岸登(1650—1702)與厲鶚、查為

69 冒廣生(1873—1959)稱汪琬:“詩及駢散文、詞,色色皆似樊榭。”見氏著:《小三吾亭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5,頁4683。

70 沈世良《小游仙詞跋》載:“昔樊榭老人製《游仙詞》三百首,西泠詞客矜為黃河遠上之作。……位置當在玉田、夢窗間,非僅為嶺南樊榭翁也。”馮乾輯校:《清詞序跋彙編》,冊3,頁1280。汪琬《讀樊榭山房詩集四首》之二自注也提到:“游仙詞三百首、南宋雜事詩百首不入集中。”汪琬:《隨山館猥稿》,卷3,《隨山館全集》(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光緒十年本),頁10上。

71 陳澧題詞為:“昔坡仙借《小秦王》以唱渭城,居士善南北曲,盍藉以歌此詞。當令聞者如聽仙樂也,江南倦客讀畢並題。”馮乾輯校:《清詞序跋彙編》,冊3,頁1280。

72 沈世良:《小摩圍閣詞鈔》(香港:崇文書店,1972年),頁3。

73 關於論詞絕句的起源與影響,可參見程郁綴、李靜:《歷代論詞絕句箋注》,頁1—4。

74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元遺山論詩絕句效少陵‘庾信文章老更成’諸篇而作也,王貽上仿其體,一時爭相效之。厥後宋牧仲、朱錫鬯之論畫,厲太鴻之論詞、論印,遞相祖述,而七絕中又別啟戶牖矣。”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16,《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1151,頁306。楊海明《從厲鶚〈論詞絕句〉看浙派詞論之一斑》:“論詞絕句,前代罕見;有之,則似從厲鶚《論詞絕句》十二首始。”楊海明:《唐宋词論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294。又,嚴迪昌《清詞史》載:“清人論詞絕句並非自厲鶚始,如常州的陳叢恒就早於厲鶚作有6首,但影響遠不如後者。”嚴迪昌:《清詞史》,頁351。

75 王偉勇:《清代論詞絕句初編》(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頁238。

仁(1695—1749)、吳錫麒(1746—1818)等人。陳澧《論詞絕句》六首雖然沒有提到厲鶚,但此種批評形式的採用與其中標舉姜、張的主張亦是延續浙派而來者。⁷⁶

另外,厲鶚與查為仁箋注的《絕妙好詞箋》在當時也是嶺南文人接觸浙西詞學的重要書籍。前述的沈世良即曾以朱筆於周容齋(即周爾鏞,浙江嘉善人。1792—1857)所批的《絕妙好詞箋》過錄本目錄寫到:“咸豐丁巳(1857)六月廿八日,用朱墨圍重閱畢。世良並記於僑梅閣。”⁷⁷又陳澧亦曾手批《絕妙好詞箋》,承繼張炎《詞源》以白石為宗的觀點外,也讚許《絕妙好詞》之選詞精萃得當。⁷⁸《絕妙好詞箋》為浙派審美重要詞學選本,不僅沈世良有閱讀圈點的記錄,陳澧亦曾手批《絕妙好詞箋》,不難想見嶺南詞人對此選本的重視。

要之,厲鶚及其相關作品不僅是道咸時期嶺南文人共同的閱讀對象,也是他們理解學習浙西範式、用以評定作品優劣的標準。即便陳澧提及厲鶚的部分並不多,但他對厲鶚詩詞顯然具有一定程度的熟習。

(三) 詞集的題記與點評

詞集評點或批語是為批評者對詞作的句法體式、構篇用意乃至於詞人風格的評價與審美意識之反映。明清詞人群體在交遊唱和之餘,相互評點詞作、切磋詞藝,以確立群體的共同審美價值並體現個人評詞觀點。陳澧與其他嶺南詞人的詞學交流亦不例外。惟這一類題記點評的記錄頗為零散,下面即分作三點為論。

1. 詞體本色之追求與填詞態度之嚴謹

關於詩詞體類之別,陳澧《憶江南館詞自序》曾提到桂文耀評其詞缺乏婉約之致,是為詩人之詞。類似的評述也同樣見於中山本《席月山房詞》的陳澧小記,只是更詳盡地交代了情事始末。他說:“張小蓬倩余題畫,余題詞題之。

76 詳可參見:王偉勇、林淑華:《陳澧〈論詞絕句〉六首探析》《政大中文學報》第7期(2007年6月),頁83—113。

77 <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0101490256/> 雅昌拍賣網。

78 可參見拙著:《試論陳澧之詞學觀:以新見抄本為中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3期(2016年7月),頁232—234。

星垣曰：‘此詩人之詞也。’余詞乏婉約之致，乃不似詞，故嘲之。”⁷⁹由於桂氏評詞以婉約爲尚，又與陳澧私交甚篤，因此才有直接評論陳澧題畫詞近詩而不似詞之說。或許當時的陳澧也意識到了自身詞作稍欠婉約，因而其後絕少填詞，直至越臺詞社以後才略有增加。惟桂氏的評論仍影響了陳澧對詩詞體類風格的認定。《自序》提到詩詞之異在於“詩尚雅健，詞則靡矣。”這裏的“靡”是相對於“雅健”的“靡麗”，指的是文采的絢麗精工與氣韻內涵的纖細婉弱，顯然也是詞主婉約之說的延伸。

循此，陳澧填詞頗爲注重自身詞作是否符合詞體婉約本色，其與友人的論詞書信中也不時可見其對填詞一事的謹慎態度。《與潘鴻軒書》之五：“近製小詞一首，擬請教。俟改定即寫呈也。”又，之六亦有：“前將奉題小詞，屢改不佳，乃改爲詩，仍不佳也。不敢自匿，錄之以博一粲。”⁸⁰潘鴻軒即潘恕，出身廣州十三行之同文行的潘氏家族，善於書畫，爲陳澧姻親。信中交代了陳澧請潘恕惠賜意見與改詞過程，最後因成果不甚滿意遂改詞爲詩。⁸¹陳澧對詞體創作頗爲嚴謹，曾提到“填一詞而過旬乃定，真無益也。然非如此則不能工，故余決意不爲也。”又云：“（填詞）有過旬乃定者，亦有經月而成者。”⁸²以爲詞的語言須經反覆地修改鍛鍊的過程，始能成其工巧。誠如況周頤所論，“（陳澧）一詞作成，當前不知其何者須改，黏之壁上，明日再看，便覺有未愜者。取而改之，仍黏壁上。明日再看，覺仍有未愜，再取而改之，如此者數四，此陳蘭甫改詞法也。”⁸³即便是被視爲“小道”、“末技”的填詞，陳澧亦不輕忽怠慢。

79 按：《憶江南館詞自序》記有：“余少日偶爲小詞，桂君星垣見之曰：‘此詩人之詞也。’自是十餘年不復作，或爲之，歲得一二闋而已。”（黃國聲主編：《陳澧集》，冊1，頁643。）中山本《席月山房詞》抄本收有陳澧另一篇記述，內容多記述陳澧與桂文耀生前相處瑣事與對話，陳澧最後寫到：“閱星垣詞集，追憶舊事，書於卷尾，以寄今昔之感。蘭甫記。”引文見：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民國稿抄本第一輯》，冊19，頁482、484。

80 黃國聲主編：《陳澧集》，冊1，頁468—469。

81 《與潘鴻軒書》之三記有陳澧爲潘恕詞集題字（或稱《鐙影詩餘》）並索討墨梅，其道：“‘鐙影詞’三字奉政。素紙一幅，祈畫墨梅，單款只題年月可矣。”同上，頁468。

82 陳澧評、黃紹昌過錄，姜夔著：《白石道人歌曲》，《白石道人四種》（澳門：澳門大學伍宜孫圖書館藏，同治十年野水閒鷗館刊本），卷3，頁2下、頁4上。

83 況周頤：《蕙風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5，頁4594。

2. 詞集題記與詞作唱和

題記作爲文人交遊的型態之一，是文人於作品脫稿之後，請託知名文人或親朋故舊鑑賞，並對作品給予評價。陳澧既爲當時知名文人，自然也有不少詞序寫作的請託。⁸⁴ 如沈世良即曾先後寄送《小摩圍閣詞鈔》與《楞華室詞鈔》兩部詞集予陳澧，而陳澧題記稱許“《小摩圍詞》似宋錦，觸手生香。”⁸⁵ 又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陳澧爲陳良玉（1814—1881）詞集題詞寫到：“朗山仁兄之官通州瀕行見示詞集，淒鏘綿麗，讀之不能釋手，奉題一律以贈行。”⁸⁶ 陳良玉爲陳澧學海堂之同僚，與陳澧多有詩詞往來。此時陳良玉將至外地赴任，陳澧爲其詞集（按：或即《梅窩詞鈔》）題詩，以爲贈別之用。⁸⁷

於唱和贈答方面，除了前文提到的越臺唱和外，陳澧與史實甫（生卒年不詳）留下的唱和記錄最多，甚至將《絕妙好詞箋》原批本贈與史氏，兩人論詞之投契可見一斑。⁸⁸ 惟史實甫詞現今不存，僅餘陳澧《金縷曲》兩首。首闕《金縷曲》（欲別還回首）詞序云：“實甫將之潮州，見示留別諸弟詞，次韻奉贈。”詞文則提到“詞筆春風同按譜，悵而今，剩我孤檠守。誰與共，論秦柳。”又次闕《金

84 《陳澧集》中雖收有不少陳澧爲他人所作的詩詞題記，卻沒有任何詩序或詞序留存。汪兆鏞曾提到“先生（即陳澧）少喜填詞，中歲後專治經，不欲以詞人傳。”陳澧現存文獻未見爲他人詞集所作之序，如非因滅失，或即是因“不欲以詞人傳”而未有相關文字著作。引文見：黃國聲主編：《陳澧集》，冊1，頁661。

85 題記云：“沈伯眉學博見示小摩圍閣詞鈔……《小摩圍詞》似宋錦，觸手生香，皆莫名其妙，但知爲天下之寶而已。一月來二寶同集案頭，抑何幸耶？陳澧讀畢並題。”馮乾輯校：《清詞序跋彙編》，冊3，頁1172—1173。

86 黃國聲主編：《陳澧集》，冊1，頁575。惟《陳澧集》所錄與原件有所出入。在此依據陳澧原件，補上朗山之下的“仁兄”二字，原詩“青燈”應作“昏燈”，且寫作年代爲同治元年（1862）。又，陳澧《壬戌臘月之杪，讀朗山宗兄〈荔香詞〉書後，即送之官通州》詩云：“寒燈濁酒送殘年，把卷長吟更惘然。酩酊市樓飄蠟淚，淒涼城角感烽煙。一官又去八千里，此地由來五尺天。北闕龍吟前日事，爲添哀怨入冰弦。”馮乾輯校：《清詞序跋彙編》，冊3，頁1212。

87 陳澧爲汪琬《題隨山館詩集》題詩云：“嶺南風雅衰積日，拔戟詞壇大有人。幕府文章歸典碩，山堂詩筆迥清新。”稱許汪琬詩筆清新，頗有振起嶺南詩風之勢。黃國聲主編：《陳澧集》，冊2，頁594。

88 《與徐子遠書》：“實甫兄將知湖州（按：汪宗衍《年譜》作‘潮州’），如弟來宜及中秋，得歡聚也。……然學使按試惠州，澧當赴任，恐不遂此願。”陳澧至惠州一事，汪宗衍編年於道光三十年（1850），其後不再有陳澧與史實甫之間的唱和記錄。同上，頁463—464。

縷曲》(痛飲如犀酒)詞序又有:“前詞已成,餘意未盡,復疊韻仿稼軒壯語,呈實甫。”⁸⁹史實甫為少數與陳澧有詞作唱和記錄的人物。雖然其生平背景不詳,但從陳澧《與徐子遠書》提到史實甫即將至潮州任事、“日來惟與實甫填詞唱和,然其語皆惘惘然,別紙錄呈一笑”,⁹⁰以及沈世良《長亭怨慢·送史實甫丈返潮郡榷舍》(問何不)這些記錄來看,⁹¹史實甫與學海堂人往來交遊亦頗密切。

3. 詞作評點與論詞記錄

評點作為一批評方法,係詞人針對某一文本或單一詞作閱讀反思過後的總體整合,可從評價用語窺見詞人審美趨向。陳澧現存對時人詞作的刪改與評點,多見於桂文燿與沈世良之詞集。現存桂文燿《席月山房詞》的四部抄本,其中的中山本不時可見陳澧圈點修改的批語痕跡。如《疏影》(綳珠裸玉)一詞即有“何減白石細膩,沉雄相間,而出最要”之評,又有“雄句似蘇”。《念奴嬌》(落花無主)有“此闕刪”。又針對《琵琶仙》(欸徑延秋)的詞前小序,陳澧建議將“令祖二字擬改大父二字。”⁹²陳澧改動故友原詞用語並刪減詞作,固然不能視為桂文燿的原意,但也表現出他對摯友存世之詞的重視。另外,陳澧與桂文燿亦留下不少論詞的記錄。如陳澧手批《白石道人歌曲》之《齊天樂》(候館迎秋)批語云:“星垣之語乃二十餘年以前所談,記之卷端,今又數年矣。忽因離宮會作者之意,惜不得起星垣而共論之。”⁹³又於沈世良《浣溪沙》(漠漠春江水拍堤)記有:“前年為桂星垣誦此詞,同賞其雋妙。星垣云:‘惜二句之法相似耳。’(案:即‘芳草不離官渡綠,野鶯新占女牆啼’兩句。)”⁹⁴陳澧與桂氏兩人詞學交遊之深摯不言可喻。

此外,陳澧也曾以白石、玉田為評詞標準,尤多見於沈世良詞。如評《臺城路》(雨聲攪入懷人句)為“此等直是張玉田復生”、《渡江雲》(城笳吹恨起)的“正關河霜迴至閑說生平”句為“直是玉田”,以及評《鷓鴣天》(靈島仙礪海客

89 黃國聲主編:《陳澧集》,冊2,頁664。

90 同上,頁461。

91 沈世良:《楞華室詞鈔》,陳建華、曹淳亮主編:《廣州大典》,冊520,頁305。

92 陳建華、曹淳亮主編:《廣州大典》,冊520,頁250、231。

93 陳澧評、黃紹昌過錄,姜夔著:《白石道人歌曲》,卷3,頁3下。

94 沈世良:《小摩圍閣詞鈔》,頁23。

貽)一闕“隨意發筆,便似白石”等。⁹⁵ 陳澧深受浙派詞學審美浸染的傾向頗爲鮮明。

四、結 語

交遊考作爲文學共時性的表現,本文以陳澧的詩詞序跋與其他材料爲中心,梳理道咸時期嶺南的詞壇概況。以下即歸納數點,以爲本文結論。

首先,陳澧的詞學評點與創作多集中於早年,中年以後因學術興趣轉變,致力於聲韻經義的著述,詞作轉爲零星。1860年以降,陳澧多有交遊的詞友,如沈世良、許玉彬、徐子遠等人,或先後故去,或因諸種原因離開廣州至他處任事,在缺乏創作同伴與環境等種種因素下,陳澧論詞、填詞或爲人作詞序等記錄亦隨之減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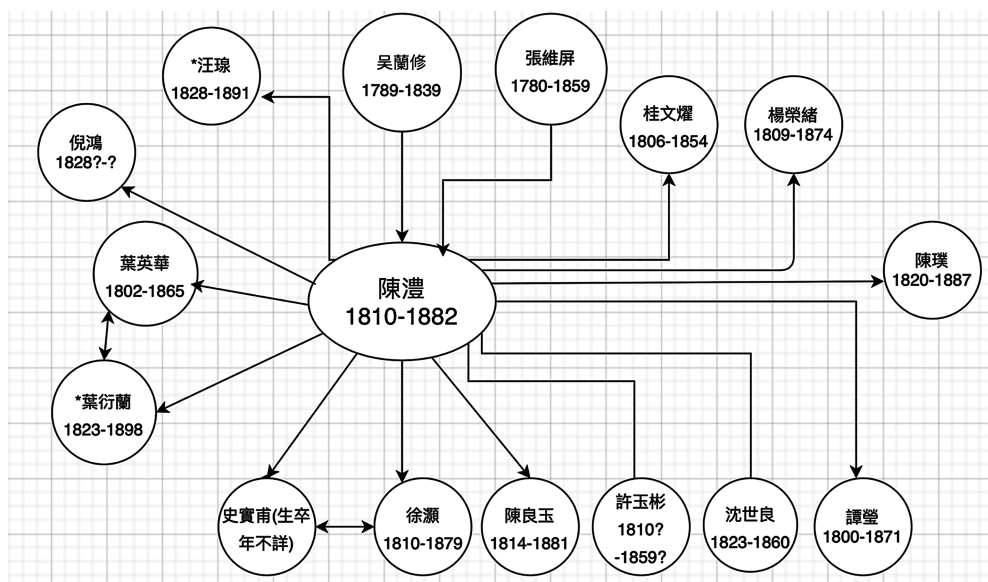
其次,陳澧之詞學交遊大抵以學海堂師生及其周邊相關文人爲主,與其有詞學交遊者,從家世背景來看,泰半先世爲由浙入粵,至第三代始入籍番禺。學海堂移植江南學術以提升嶺南學風的創設本旨,也助長了江南學術在嶺南的流傳,浙西詞論亦在此時爲嶺南文人所廣泛接受。除厲鶚之詩詞文集與《絕妙好辭箋》成爲嶺南文人爭相閱讀的書籍外,文人評詞亦多以白石、玉田等相互標榜。⁹⁶ 清中葉後浙派於江南地區的影響力逐漸爲常派取而代之時,嶺南一地因地處偏遠,資訊流通不易,至道咸時期仍是浸淫於浙西宗風。

嶺南文人繼受江南考據學的傳統,試圖通過金石考據與歷史追索重新形塑嶺南/廣東地域文化的認同傾向,同樣可見於文學層面。《粵東詞鈔》所收的詞作雖以國朝(清)詞人,尤其是與陳澧往來的學海堂人作品爲多,惟編者追溯廣東詞學至南漢爲始的意圖,表現出學海堂文人群對建構嶺南文學史的意欲。並且,學海堂文人在詞社唱和吟詠之際,也常用南漢或是與之相關的歷史景點爲同題共作的素材,如扶鸞道、越王臺等南漢故址等。

⁹⁵ 沈世良:《小摩圍閣詞鈔》,頁9、21及40。

⁹⁶ 按:《景石齋詞略序》爲光緒六年(1880),陳澧過世前兩年的作品,可視作陳澧對自身學詞歷程的總結。見:黃國聲主編:《陳澧集》,冊1,頁373。

總之,陳澧的詞學交遊提供了我們從文化層面考察道咸時期嶺南詞壇的可能,包括地域認同意識發展、浙派審美於嶺南的受容與轉化,以及晚清廣東詞學意識與創作主題的轉折與國家情勢的相關性等。多數人論及近代廣東詞壇多從晚清國體與內憂外患的角度,試圖由鴉片戰爭詞建構世變“詞史”的寫作型態。然嶺南詞壇的發展為時甚短,其間的詞學風氣與關注的議題亦隨著晚清整體國勢而轉變。希冀通過陳澧交遊考的寫作,補足學界對清代嶺南詞壇的發展的研究未盡之處,並以此為基礎,日後逐步拓展至民國嶺南/廣東詞學等研究分野。



◎陳澧及其交遊人物示意圖(簡版)其中有*字樣者,為陳澧之學生輩。

(作者:臺灣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引用書目

一、中文

(一) 專書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王偉勇：《清代論詞絕句初編》，臺北：里仁書局，2010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

中國地方志集成編輯工作委員會：《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番禺縣續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 年。

玉等修、梁紹獻等纂：《南海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

左岩：《粵東三家研究》，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年。

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 年。

李緒柏：《陳澧》，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 年。

汪琬：《隨山館全集》，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光緒十年本。

汪宗衍：《陳東塾先生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 年。

沈世良：《小摩圍閣詞鈔》，香港：崇文書店，1972 年。

沈世良、許玉彬編：《粵東詞鈔》，陳建華、曹淳亮主編：《廣州大典》，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 年。

屈大均：《廣東新語》，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年。

況周頤：《蕙風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冒廣生：《小三吾亭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科大衛（David Faure）著、卜永堅譯：《皇帝與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年。

姜夔著，陳澧評，黃紹昌過錄：《白石道人四種》，澳門：澳門大學伍宜孫圖書館藏，同治十年野水閒鷗館刊本。

倪鴻：《桐陰清話》，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1924 年。

- 孫克強：《清代詞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 孫克強、楊傳慶、裴喆編：《清人詞話》，南京：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 年。
- 桂文耀：《席月山房詞》，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民國稿抄本第一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年。
- 徐灝：《攬雲閣詞》，陳建華、曹淳亮主編：《廣州大典》，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 年。
-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
- 陸有富：《文廷式詩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
- 陳永正：《嶺南文學史》，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年。
- 陳聲聰：《填詞要略及詞評四篇》，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 年。
- 陳建華、曹淳亮主編：《廣州大典》，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 年。
- 陶穀、吳淑著：《清異錄 江淮異人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 張炎撰、吳則虞校輯：《山中白雲詞》，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 管林、陳永標等：《嶺南晚清文學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 年。
- 黃國聲主編：《陳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 程郁綴、李靜：《歷代論詞絕句箋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
-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
- 許玉彬：《冬榮館遺稿》，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
- 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 年。
- 楊海明：《唐宋詞論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年。
- 葉英華：《花影吹笙詞鈔》，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光緒三年羊城刻本。
- 葉恭綽編：《全清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 黎細玲編：《香山人物傳略(一)》，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 年。
- 謝永芳：《廣東近世詞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戴肇辰等修、史澄等纂：《廣州府志》，廣州：光緒五年粵秀書院本。
-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
- 譚敬昭：《聽雲樓詩鈔》，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藏，道光二十一年本。
- 譚獻：《復堂詞話》，《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譚瑩：《樂志堂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臺灣“故宮博物院”編：《陳蘭甫先生書畫特展目錄》，臺北：臺灣“故宮博物院”，1979年。

（二）論文

李曙光：《姜張詞風流播嶺南論述》，《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頁55—64。

余佳韻：《試論陳澧之詞學觀——以新見抄本爲中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3期（2016年7月），頁203—234。

范松義：《清代嶺南越臺詞社考論》，《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頁89—93、155。

范松義：《清代嶺南的詞學家族與家族詞學》，《東莞理工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頁64—68。

范松義：《陳澧〈憶江南館詞〉簡論》，《廣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頁52—56。

范松義：《清代嶺南與嶺外詞人交流考論》，《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頁12—17。

容肇祖：《學海堂考》，《嶺南學報》第3卷第4期（1934年1月），頁1—148。

梁守中：《陳澧的〈憶江南館詞〉與〈白石詞評〉》，《嶺南文史》1999年第1期，頁43—45。

陳柏言：《異物如何成爲知識：論中晚唐嶺南異物書寫》，《中外文學》第50卷1期（2021年3月），頁19—60。

陸有富：《陳澧詞學觀探論》，《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頁65—70。

王偉勇、林淑華：《陳澧〈論詞絕句〉六首探析》，《政大中文學報》第7期（2007年6月），頁83—114。

謝永芳：《陳澧的詞學研究》，《東莞理工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頁81—86。

謝永芳：《清代民國廣東詞人生卒年考正》，《文獻》2008年第1期，頁38—39。

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著、車行健譯：《學海堂與今文經學在廣東的興起》，《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卷第2期（2006年3月），頁13—20。

廣州市政協門戶網站

http://www.gzzxws.gov.cn/qxws/lwzs/lwzj/lwd_5/201012/t20101206_19959.htm

雅昌拍賣網

<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0101490256/>

雅昌藝術網

<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0101490234/>

二、英文

(一) 專書

Steven B. Miles, *The Sea of Learning: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Steven B. Miles, *Upriver Journeys: Diaspora and Empire in Southern China, 1570 – 185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2017.

(二) 論文

Elman, Benjamin A., “Ch’ing Dynasty ‘Schools’ of Scholarship”, *Ch’ing-shih wen-t’i*, 4. 6 (1981), pp.1 – 45.

Ping Wang and Nicholas Morrow Williams, “Southland as symbol”, *Southern Identity and Southern Estrangement in Medieval Chinese Poetr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1 – 18.

Steven B. Miles, “Rewriting the Southern Han (917 – 971): The Production of Local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2.1(2002), pp.39 – 75.

A Study of Lingnan *Ci*-poetry of the Daoguang and Xianfeng Eras, with a Focus on Chen Li and His Social Network

Yu Jia Yun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Lingnan has long been seen as an uncivilized region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Ruan Yuan (1764 – 1849) established the Xuehai tang in Guangzhou. He introduced the theory of evidential research from the Jiangnan region, and thereby consumma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Cantonese literati's cultural identity.

Previous research of Lingnan *ci*-poetry has laid more emphasis on its transitio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an the Daoguang, Xianfeng, and Tongzhi reign-period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i*-poetry of Chen Li (1810 – 1882) and its peripherals to observe his social networ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ngnan *ci*-poetry. First, it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eception to observe that most of the Lingnan literati's ancestors were immigrants from Jiangnan in the early to middle stage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refore, they succeeded not only the academic tradition of Jiangnan but also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literary aesthetics. This explains why Chen Li and his fellow literati took the aesthetics of the School of Western Zhejiang as an evaluation standard for *ci*-poetry. Second, in addition to tracing the history of Lingnan to the Southern Han Kingdom (917 – 971) by examination of relevant historical evidence, the Xuehai tang scholars organized poetry clubs and compiled Lingnan *ci*-poetry anthologies to represent the uniqueness of Lingnan culture.

The study of Chen Li, an immigrant from Jiangnan and a leader of the Xuehai tang, and his social network not only enables us to understand Lingnan *ci*-poetry in the mid and late Qing dynasty, but benefits us by learning a different face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poetry of the region.

Key words: Lingnan, Jiangnan, Chen Li, Social network, *Selected Ci-poems from Eastern Canton Province*